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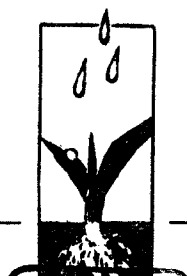
儿歌浅谈

ERGE QIANTAN



儿歌浅谈

蒋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成都

封面设计：曹辉禄

儿 歌 浅 谈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97 千
1979年12月第一版 197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 册

书号：10118·205 定价：0.43 元

目 录

第一章 儿歌的历史及发展

- 第一节 儿歌的概念 1
- 第二节 我国古代的儿歌 3
- 第三节 我国现代的儿歌 10
- 第四节 在斗争中成长的新儿歌 19

第二章 儿歌的特点及教育作用

- 第一节 儿歌的特点 23
- 第二节 儿歌的教育作用 29

第三章 儿歌的艺术形式

- 第一节 儿歌的一般艺术形式 42
- 第二节 儿歌的特殊艺术形式 53

- 一、摇篮曲 二、谜 语 三、数数歌 四、急口令
- 五、问答歌 六、连锁调 七、滑稽歌 八、游戏歌

第四章 儿歌常用的表现手法

- 第一节 比兴 86
- 第二节 拟人 94
- 第三节 夸张 100
- 第四节 摹状 106

第五节 设问	111
第六节 反复	118
第五章 新儿歌的创作	
第一节 目前儿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126
第二节 繁荣儿歌创作的几点意见	141

第一章 儿歌的历史及发展

第一节 儿歌的概念

儿歌，古称童谣。一般常把儿歌与童谣合在一起，统称儿童歌谣。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还有“童子歌”、“儿童谣”、“孺子歌”、“小儿谣”、“小儿语”、“小孩语”、“孺歌”等等名称。

关于儿歌的概念，我国古代学者曾作过种种解释。《列子·仲尼篇》说，“尧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这里所说的“儿童谣”，大概就是后代“儿歌”、“童谣”两词的本源吧！韦昭注《国语·晋语》也曾对童谣作过诠释：“童，童子，徒歌曰谣。”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五中，对童谣作了更详尽的阐释：“尔雅曰徒歌曰谣，说文谣作晋，注云，晋从肉言。今案徒歌者，谓不用丝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声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谣，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晋孟嘉曰：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谓徒歌曰肉声。即说文肉言之义也。”

根据上述解释，古代所谓“童谣”，就是指流传在儿童中间的一种不用乐器伴奏的“徒歌”。

今天一般习惯所说的“儿歌”这个名称，是“五四”运动中才出现的。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创办了《歌谣周刊》，发表了不少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整理的童谣，最早冠以“儿歌”的名称，于是儿歌一词就一直沿用至今。

从儿歌的创作和流传的过程考察，儿歌实际上是包括民间流传的传统童谣和现代创作的新儿歌在内的广义名称。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学文化和受教育的权利，他们世世代代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把自己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体会、思想感情和愿望，用顺口、易记的歌谣形式表达出来，并用以教育子女。因此，旧时代的儿歌，几乎全是劳动人民包括他们的子女在内的集体口头创作，是从属于人民口头诗歌创作范畴的。

解放后，我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人民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文化上也同时翻了身。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地关怀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子女，并给他们创造了各种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同时大力提倡发展儿童文学事业，开辟了一个繁花似锦的百花园地。因此儿歌的创作和流传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有劳动人民和孩子们自己的口头创作，也有广大儿童文学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书面创作。儿歌的天地更为广阔了。

如上所述，儿歌本来是从人民生活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歌谣的一种，既是人民口头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儿童文学不可残缺的品种；其中有儿童自编自唱的，也有成

年人拟作的，但拟作者必须从儿童心理出发，照顾儿童的生活知识和心理特点，才能反映儿童的生活、思想感情和他们对客观事物的看法。由于儿童并非孤立于社会之外生活在一个独立的儿童王国之中，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不可能不反映到他们的头脑里，因此儿歌所反映的必然会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社会内容。

总之，儿歌是以年龄较小的儿童为对象，既具有儿童的特点，又具有民歌的艺术风格，为儿童所喜爱的一种可吟可唱的简短的诗歌。

第二节 我国古代的儿歌

我国儿歌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广的群众基础。可惜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今天保存下来的资料已不多了。

从现在可查考的书面资料看，中国古代搜集记录的儿歌，最早的记载见于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著作中，如《战国策》、《春秋左氏传》等书。

我国古代的一些诗歌总集中，有人对儿歌也曾作过一些收集整理的工作，但很少从孩子们口头上采集，而是抄录了前人的书面资料，因此意义不大。

到了十六世纪以后，明清两代人们才开始重视儿歌的收集、研究工作。一五九三年，明代吕坤编的《演小儿语》刊行，我国才出现了第一部个人收集整理的儿歌集。全书收儿

歌四十六首，是编者根据他在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收集到的民间童谣创作整理的。

吕坤的父亲吕德胜（？—1568）编过《小儿语》和《女小儿语》各一卷，并写过一篇《小儿语序》，认为儿歌可使“童子乐闻而易晓”，“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这些认识虽不算是十分正确的意见，但他确实是较早发现儿歌的艺术力量和教育作用、并加赏识的先驱者。他除了身体力行，运用儿歌来宣传“立身要务”外，还叮嘱他儿子吕坤继承自己未竟的事业。后来吕坤为完成先父遗志，编了《续小儿语》三卷和《演小儿语》一卷，总称《小儿语》，附于他的著作《去伪斋全集》之后刊行于世。可是，除《演小儿语》外，其他五卷都不是儿歌，只是一些格言式的韵语。这部书卷首刊吕德胜的《小儿语序》，卷尾有吕坤的《书小儿语后》，倒是两篇研究我国古代儿歌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这两篇序跋中，谈到了童谣世代流传的特点，以及对孩子们的巨大教育作用，同时还介绍了他父子俩整理、创作儿歌的心得体会。这在当时来说，是颇有些新意的。

到了清代，因受到重视儿童教育等近代思潮的影响，从事儿歌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人就更多了。如由钱塘人郑旭旦编辑、许之叙校定的《天籁集》，就是搜集了南方江浙地区童谣汇编而成的一本优秀儿歌集。这书的编成年代已不可考，估计在康熙初年，现存的最早版本是同治壬戌（1862）年芝秀轩刊本。全书共收儿歌四十六首，编者在每一首儿歌

后面都加了评语和按语。此后有悟痴生编的《广天籁集》，采集了浙江儿歌二十三首，卷首有编者自序，题“岁在壬申（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七月既望山阴悟痴生识”，后有戴山老叟、明湖钓叟、粥粥子、弇山外史、自足斋主人、天偶遯客的评语。体例仿照《天籁集》，成了《天籁集》的续编。与此同时编成的还有《北京儿歌》，有“百本堂”、“别梦堂”钞本流行于世。清末意大利驻中国使馆的官员韦大利（Guidovitole）也收集了北京地区流传的儿歌一百七十首，题名《北京儿歌》，于1896年出版。书中英汉文对照，书前有编者写的《北京的歌谣序》。除上述以外，还有1900年在美国纽约印行的《孺子歌图》和1906年在国内刊行的《下里歌谣》等。

以上这些集录工作，由于收集、选编者的世界观所决定，往往选入一些意义不大的和非劳动人民的作品，甚至录入一些含有毒素的作品，但也为后人保存了好些优秀的儿歌资料。

从现存的书面资料看，我国古代儿歌确实有不少宝贵的艺术珍品，它们用孩子们能理解的语言，反映了许多重大的社会事件，不但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种种不合理的历史现实的清醒认识，同时也鼓舞了人们反抗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斗志，使孩子们对现实社会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例如秦始皇时的童谣：

阿房，
阿房，
亡始皇。

这首儿歌以强烈的憎恨感情，指出秦始皇横征暴敛的罪行，说明他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是当时社会生活最尖锐、最直接、也是最迅速的反映。又如汉顺帝末年的京都童谣：

直如弦，
死道边；
曲如钩，
反封侯。

还有汉桓灵时的童谣：

举秀才，不知书；
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龟。

这两首童谣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本质，暴露了那班统治者的真面目，多么尖锐痛快，多么深刻有力！这类儿歌往往成了广大人民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口头传单，通过孩子们的嘴，广为流传，号召人们起来斗争，因此起着动摇反动政治基础的革命作用。

每当社会有着重大变革的动荡时期，就有大量儿歌应运而生，口口相传，不胫而走，成为战斗的匕首，刺向敌人。如明末的《宋孩儿起数》：

孩儿军帅孩儿兵，
孩儿攻战管教赢，
只消出个孩儿军，
孩儿夺取北京城。

——《明季北略》

多么形象而又传神地唱出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部队中孩儿军的英武豪迈的气概！

这类童谣是人民斗争生活的智慧的结晶，成了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我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军就曾利用儿歌作为政治宣传的武器。李自成起义军的《迎闯王》、太平天国的《迎天兵》等，就是这样的范例。例如太平天国时期流传过这样一首儿歌：

板凳摇摇，
上街瞧瞧，
官兵、东家来没来？
来了把门关起来。

板凳摇摇，
上街瞧瞧，
天父天兄来没来？
来了把门开开来。

它反映了广大人民强烈的阶级爱憎。不单是儿童唱，成人也唱，唱遍了城乡，唱动了人心，唱来了胜利，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儿歌本来就是表达劳动人民的心愿和感情的一种方式。在那吃人的封建社会里，沉重的阶级压迫，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劳动人民就借儿歌这一口头创作来诉说内心的愤懑不平和反抗意志，而且往往采用幽默的口吻，具有一般民歌的乐观主义传统。如清代的儿歌：

大雪纷纷下，
柴米都涨价，
乌鸦满地飞，
板凳当柴烧，
吓得床儿怕。

——郑旭旦辑《天籁集》

就反映了当时在物价飞涨，粮尽柴光的情况下，劳动人民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歌词以内涵深沉的感情，用一种含泪的微笑控诉了人间的不平。

仅略举数例，已可约略看出这些短小的儿歌，反映了极为深刻的社会内容，是真正高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可以断定，这类作品数量一定不少，但由于当时不被人们重视，其中大部分跟旧社会其他民间口头文学一样，没有被保存下来而散失了。如今，侥幸残存下来的少数几首，应该被视为我国儿

童文学史上最灿烂的珍珠之一。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是两个对抗的阶级。统治阶级的文化与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也是对抗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扼杀劳动人民的文化。儿歌也不例外。现在流传下来的我国古代儿歌，也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文化的斗争。

在延续两千多年的我国封建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一直利用儿歌当作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在明代以前的一千多年间，大多数“童谣”被作为人间灾异祸福的谶语，用来诠释社会政治的变动，宣传五行迷信思想，为巩固反动政权服务。我国古代儿歌研究中，以“荧惑说”最流行。他们用唯心主义的阴阳五行的学说，对童谣的含义及其实质作了十分荒谬的解释，把儿歌当作预示凶吉的“诗妖”，胡说它的产生是“荧惑星”降凡，“惑童儿歌谣嬉戏”（《史记·天宫书》）。

《东周列国志》的编者，曾将晋书、魏书等典籍中有关的说法作了综合：“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写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这样的解释，不仅给儿歌涂抹上一层厚厚的迷信色彩，而且在当时五行学说的影响下，所收集的童谣，大多数都是被歪曲或篡改了的伪作。如《迎闯王》：

吃他娘，
穿他娘，
开了大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

这首儿歌本来是在李自成起义时流传民间的，起着宣传革命、号召群众的作用。可是一到封建文人笔下，就被篡改成：“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够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见《吴忠节公遗集》卷三）从这里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反动的阶级利益，对民间儿歌的歪曲和篡改，是不择手段的。

有时，统治阶级还伪造一些儿歌，向孩子们灌输宿命论思想，借以作为愚民的工具。例如，“星宿子，密又稀，莫笑穷人穿破衣，十个指头有长短，山林树木有高低。苏家嫂，朱家妻，爱富嫌贫后悔迟。”这显然是教劳动人民要知天乐命，安于受剥削、受压迫的现状，要他们甘心情愿地做统治阶级驯顺的奴隶。

因此，今天我们研究儿歌，对古籍中保存下来的童谣，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认真地分析，作一番去芜存精、去伪存真的辨别工作，才不至上当受骗。

第三节 我国现代的儿童歌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它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在“五四”运动中，我国思想战线上

出现了一个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

在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提倡搜集近代歌谣，在我国撒下了儿歌科学研究的种子。一九一七年，北大蔡元培、沈尹默、刘半农等人，为了倡导新诗，要在本国文化里找出它的传统来，于是注意到歌谣，并于第二年开始征集歌谣，建立歌谣研究会，儿歌同时为收集、研究者所重视。我国现代儿歌的历史就由此开始。当然，我国现代儿歌与古代儿歌有着血缘关系，它不是凭空产生的。现代儿歌是在继承、发展古代儿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工人阶级登上我国政治舞台，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这一切彻底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在这大革命时代产生的儿歌，是这个暴风雨般的革命时代的反映。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和以前的儿歌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伟大的革命运动中，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儿童歌谣的战斗作用。如在广东海陆丰一带领导革命的澎湃同志，就曾亲自创作童谣，教育农民，组织革命。《田仔骂田公》就是一例：

冬冬冬！

田仔① 骂公田②：

①田仔：佃户

②田公：地主。

田仔做到死，
田公吃白米。
田公唔^①知死，
田仔团结起。
团结起来干革命，
革命起来分田地。
你分田，我分地，
有田有地真欢喜，
免食番薯食白米。
冬冬冬！
田仔打田公。
田公四散走，
拿包斗^②，
包斗大大个，
割谷免用还。

在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革命人民继承了我国儿歌的战斗传统，自觉地运用这个武器来为革命服务。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产生过许多激动人心的革命儿歌。有的唱出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对党和领袖的热爱：

①唔：不。

②包斗：地主收租谷的斗。